上海企业“走出去”事中事后 监管机制研究

路建楠¹

企业“走出去”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推动企业“走出去”是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上海作为我国以开放促改革的排头兵和“一带一路”的桥头堡，承担着推动企业“走出去”、建立符合国际惯例高标准监管制度的重要使命，尤其是在我国针对“走出去”企业事中事后监管尚未破题的情况下，上海的先行先试相关探索尤为重要。本文从上海企业“走出去”事中事后监管存在的问题瓶颈切入，围绕构建多元共治的监管格局、确立以企业海外经营行为为核心的监管内容体系、创新与企业海外经营相匹配的监管方法手段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一、对“走出去”企业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背景要求

（一）深化对外投资合作领域“放管服”改革的要求

近年来，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部署和要求，国家有关部门积极推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包括建立境外投资“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管理方式，优化境外投资管理流程，提高投资项目备案效率；积极推动境外投资项目实行事后备案制；简化境外投资项下外汇登记、对外担保等外汇管理手续，加快推进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改革，鼓励使用人民币开展境外投资等。另一方面，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优化外资产业结构、优化外资区域布局、优化招商引资方式等，加大力度服务对外投资企业。整体而言，我国在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方面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好的做法和经验，但在“放管结合”环节，如何在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过渡的过程中，找到新的监管抓手、形成一套体系化的事中事后监管方案，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二）“一带一路”战略中加强企业走出去监管的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新时期经济转型、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引擎，也成为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整合全球优势资源、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然而，近些年来，有些企业走出国门后却出现了经营困难、与当地引发矛盾等问题。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引导和推动更多中国企业发挥“走出去”的主体作用，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大局，已成为我国政府全面深化改革、谋求更大发展的当务之急与重要课题。加强企业走出去的事中事后监管，有助于推动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和竞争力、增强抗风险能力，同时也是加快培育跨国公司、彰显对外形象的重要手段。因此，当前要着力加强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合规制度建设，将推进便利化和有效防范风险紧密结合，加大力度规范海外企业经营行为，促进走出去企业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三）上海先行先试探索企业走出去监管制度的要求

作者简介：路建楠，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体制改革研究所，博士。

过去，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我国大批企业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而我国对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相关审批制度颇为繁琐，企业为了获取相关部门的批准，需要准备大量审批材料，耗费大量精力，且相关审批耗时漫长，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传统审批方式成为了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拦路虎，对这样的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迫在眉睫。上海自贸试验区将事前审批制度创新改为事前授予企业对外投资额度，加强对企业事中和事后监管，从而极大地解决了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国内审批障碍，为企业对外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前，随着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逐步深化，上海正按中央部署筹划建立自由贸易区新片区，针对越来越多区内设立的“走出去”企业，如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尚未破题。因此，先行先试，探索创新企业走出去监管制度，实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金融、外汇、投资和出入境管理制度，是现阶段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对“走出去”企业加强风险防范促进健康发展的要求

我国企业境外投资虽然总体较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企业未能准确把握国家“走出去”战略导向，开展境外投资缺乏系统规划和科学论证，盲目决策，后续经营困难，造成较大损失；有的企业将境外投资重点放在房地产等非实体经济领域，不仅未能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反而导致资金跨境流出大幅增加，债务“留”国内，资金“流”国外，冲击金融安全；有的企业忽视投资目的国环保、能耗、安全等标准和要求，投资投产后引发与当地民众的纠纷，有时不得不停工，既造成经济损失，也损害我国对外形象。对外投资领域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有助于在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同时，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在政策引导下为走出去“祛虚火”，推动“走出去”的国内企业健康发展。

二、上海企业“走出去”事中事后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上海企业“走出去”事中事后监管在部门协同、多元共治、手段模式、法制保障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各部门齐抓共管总体格局尚未形成，政府、社会机构、企业、行业多元共治的监管机制仍待建立，对大数据等新技术、新手段的运用还不足，监管相关法制保障仍不健全等。以下结合相关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一）监管总体格局尚未形成

目前，上海对外投资的监管和服务机构主要包括三类：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财政局、国资委、发改委等政府职能部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专门机构；国际投资促进会、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国际商会等准政府机构。这三类政府部门和管理机构针对本条线的监管和服务内容各守一摊，彼此之间监管方式、监管信息、监管手段的协同共享不足，齐抓共管的监管总体格局尚未形成。突出表现为：往往从自身管理权和利益出发制定管理办法，多头管理，导致或是在一些方面介入过多过深，在其他方面介入不足甚至缺位，或是主要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忽视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投资监管和服务体系“重管理，轻服务”“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重国有大型企业，轻民营中小企业”等现象。

（二）监管的相关机制不完善

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浦东新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后，已经逐步构建起了市场主体自律、业界自治、社会监督、政府监管互为支撑的监管格局，开放条件下的公共治理能力全面提升，市场和社会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但上海针对“走出去”企业的事中事后监管中，企业、行业组织、第三方社会机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等多方面多元共治的监管机制尚未形成。突出表现在：对企业走出去的监管仍以政府部门的审批、巡查等为主要内容，海外企业商会资源整合不足、行业协会海外经营自律规范发挥作用有限、市场监管服务社会化程度不高、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监督服务协同能力仍待提升等。

（三）监管方式方法有待创新

当前，对企业走出去的事中事后监管中，对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新手段的运用还不足，监管方式方法还有待创新。集中体现在：受制于传统监管定式，在对外投资领域运用大数据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新思维尚未形成；跨部门整合数据难度较大，各部门监管信息各走一线，难以全方位呈现市场主体对外投资信息；企业境外投资综合监管信息平台尚未建立，利用统一平台加强协同监管难以实现；数据安全不容忽视，涉外投资信息的风险防范要求高、难度大；运用第三方平台分析软件和大数据技术加强“走出去”企业风险预警的探索尚显不足等。

（四）监管的法制保障不健全

当前，针对“走出去”企业违法经营行为存在罚则不明、法律底线不清晰的问题，事中事后监管相关法制保障尚待完善。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方面，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出台的文件均是以国务院部门政策形式出现的一种行政管理政策，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法律体系尚未形成。另一方面，相关政策文件的地方实施细则有待完善。如，2017年底，国家发改委、人行、外交部、商务部等28个部门联合发文，发布《关于加强对外经济合作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上海各相关委办局针对相关指导意见的实施细则还应加快制定实施。

三、基本思路

（一）多元参与

构建市场主体自律、行业自治、社会监督、政府监管、国际协作的多元共治格局和综合监管体系，建立健全重点行业、领域和主体的监管机制，打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覆盖全活动周期的事中事后监管网络，推动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第三方社会机构、驻外机构等多元参与，形成监管合力。

（二）放管结合

当前，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对“放”强调得较多，未来应逐步加大“管”的力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做到既要简政放权，又要管住管好，以有效的“管”保障有力的“放”，通过有力的“放”与有效的“管”更好地释放“走出去”企业的活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三）国际规则

努力构建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立与国际惯例相接轨的企业对外投资监管体系，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敦促企业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遵循国际规则和惯例，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提升上海及其“走出去”企业的国际地位与形象，逐步扩大对相关投资监管规则的影响力和制定权。

（四）制度创新

上海是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核心功能是以制度创新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要始终将开放与体制改革相结合，将培育功能与政策创新相结合，把住“制度创新”这条主线，对标国际最高标准，率先在“走出去”企业事中事后监管方面加强制度创新。

（五）底线思维

境外投资既要坚持市场化原则，又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在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的同时，防范境外投资风险，牢固树立

监管“红线”，针对企业海外经营的突出问题，依法依规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制度建设，推动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健康持续发展。

四、路径举措

下一步，要以构建多元共治监管格局、健全以企业海外经营行为为核心的监管内容体系、创新与企业海外经营相匹配的监管方法手段为核心内容，规范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管理，跟踪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事中事后进程，保障企业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主体地位，建立监管高效、服务到位、保障有力的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综合管理体制，推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管理方式从事前核准备案为主向事中事后服务监管为主转变，促进上海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持续健康发展。

（一）谁来管：构建多元共治的监管格局

在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宏观管理下，发挥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境外中资企业商会协调自律、驻外使领馆一线监管、与东道国合作管理的对外投资合作管理机制，建立健全企业海外经营行为监管体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作配合，做好企业海外经营行为监管工作。

1、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境外投资决策、授权管理、财务管理以及境外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数据资料的境内报送和归集等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合规经营制度、体系和流程，配备合规经营专职管理人员，履行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一是加强境外人员管理。企业按照商务部《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指南》要求，做好外派人员的选审、行前安全、纪律教育和应急培训工作，加强对外派人员的管理，依法办理当地合法居留和工作许可，为外派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做好境外劳工保护等工作。二是强化境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企业境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为境外安全生产经营第一责任人，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对境外生产管理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培训制度，加强境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遵守所在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完善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规章制度，创立安全生产相关文件、案例、经验的电子化群公布机制，建立境外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三是积极履行环保责任。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企业应遵守东道国环保法规，履行环境影响评价、达标排放、环保应急管理等相关环保法律义务；鼓励企业研究与国际接轨，研究和借鉴国际组织、多边金融机构采用的环保原则、标准和惯例。四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企业应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保障当地员工合法权益、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加强对外沟通交流，促进与当地文化的融合，树立中国企业依法经营、重信守诺、回馈社会的良好形象。

2、加强行业组织自律

鼓励和发展各类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形成健全的非政府组织体系，合力培育市场监督与支撑服务体系。一是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行业协会应加强企业之间的联系、交流和沟通，加强行业自律，推动行业协会建立健全行业经营自律规范、自律公约和职业道德准则，规范会员行为。加强行业协会、商会自身建设，增强参与市场监管的能力。二是推进海外上海商会建设。整合上海政府、企业、个人的海外关系和资源，发挥上海现有海外企业和工程承包基地的作用，依托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上海商会，在上海企业投资热点地区推荐熟悉当地情况的上海企业家或海外华侨担任召集人，全面推进海外上海商会建设。

3、探索社会机构监督

探索市场监管服务社会化，切实提高中介组织的服务质量，公证、律师（包括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处）、会计、管理咨询等社会中介机构应增加为企业“走出去”服务的业务。一是支持专业服务机构发挥监督作用。鼓励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

等依法在企业财务、纳税情况、交易行为等方面提供中介服务。鼓励各类行业协会和仲裁机构等组织通过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市场主体之间的争议。二是支持信用服务机构开展相关业务。鼓励信用机构开展信用征集、信用调查、信用评级、信用管理咨询、信用保理等业务，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高质量的信用产品和服务。三是完善对外投资保险保障体系。进一步增加中信保公司对境外投资的保险额度，鼓励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入，进一步放开对融资性担保的余额控制，推进境内外社会保障和保险的对接以增强对海外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权益的保障。四是加速培育和引进国际市场调查公司。鼓励相关企业为境外企业提供资信证明、目标国的法律法规咨询及法律可行性意见书，调查和提供外国合作方的资质、信用及项目经济可行性评估，为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高质量的研究咨询报告。

4、推进政府行政监管

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引导、服务、规范和保障，通过完善体制机制、依法依规监管、落实奖惩措施、优化服务保障、健全法律法规等措施，让守法合规企业走出去更加便利、违法违规企业受到应有惩戒，不断提升企业依法合规经营的意识和能力。一是提高政府监管效能。创新监管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与市场监管需求相适应、公平规范的监管机制，推动监管方式向长效化、规范化转变；推动监管理念向规范为主、事前防范转变；推动监管手段向信息化、科学化转变。二是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加强发改委、商务委、国资委、外汇局、金融办、税务局、公安局、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加强对境外领事保护和税收政策指导，构建各部门“走出去”企业综合监管信息平台。协调解决重点企业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中遇到的审批、融资、保险、招商、人才培养等问题。加大部门联合惩戒力度，建立重点违规企业“黑名单”制度。三是重视行政管理与司法衔接。尊重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主体民事权利，建立以司法救济为主的民事争议解决机制，鼓励在对外投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中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企业和个人依法申请司法救济，通过让违法者承担民事责任实现主体自律。四是全方位监管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过程的税收行为。重视国际税收管理组织建设，加强反避税、税收情报交换、税收协定的执行、非居民税收管理及外国税收抵免，积极谈签税收协定和预约定价安排，联手打击国际逃税避税。

5、开展国际合作监管

加强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协同合作，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监管。一是加强监管预警体系建设。通过与东道国建立银行、税务等信息共享通道等方式，加强对海外投资的风险监测，建立对外投资国别风险数据库以及针对主要市场的风险评估和预警体系。二是构建国际经贸支持网络。加强与境外地方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和投资促进机构，会计、法律等商务服务中介机构以及商、协会的合作关系；加强与我国驻外使领馆、经商处以及境外驻华使领馆、办事处的联系，为上海的境外投资企业提供政府支持。

（二）管什么：以企业海外经营行为为核心的监管内容体系

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事中事后监管，关键是要构建以海外投资主体、投资行为、投资资金为监管重点，以企业海外经营行为为核心的监管内容体系。

1、加强海外投资主体监管

针对不同类别的投资主体，采取相应的有所区别的监管措施。一是严格规范国有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加强对国有企业海外经营行为的规范工作，强化国有企业主业管理，针对国有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定期开展监督检查。突出规范效果，将党纪政纪、法律规定、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等制度措施延伸到国有企业“走出去”领域。对出现海外不规范经营行为的国有企业，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并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并区分情节轻重，给予诫勉谈话、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对因海外不规范经营行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恶劣影响的，依法严格追责。二是加大民营企业对外投资事后监管和服务。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原则，只要符合东道国准入条件的都宜给予通过，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逐步对民企境外投资项目采取登记制，简化对外投资审批管理，促进对外投

资合作便利化。建立“非禁即入”援外准入制度，取消准人审查制度，向具备工程承包资质的企业放开成套项目援外资格，向具备进出口经营权企业放开物资供应商资格。着重防止投资移民、资本外逃和境外非法经营问题。

2、加强海外投资行为监管

以落实管理责任、明确监管重点、加强监督检查、强化责任追究为主要内容，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行为监管。一是落实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的管理责任。各监管部门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切实履行对企业海外经营行为的监管责任，防止出现监管真空。二是加强境外投资真实性审查。企业应确保境外投资真实存在、所有投资安排皆出于真实商业需求。在开展境外投资过程中存在洗钱、虚假投资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及相关投资决策人员将被纳入境外投资黑名单，并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三是明确企业海外经营行为监管重点。加大对企业海外经营突出问题的监管力度，严禁无证无照赴境外开展投资合作、不履行国内外手续等行为；严禁片面追求业绩、不顾成本对外投资或承揽境外项目；严禁项目实施中忽视质量和安全管理或出现问题隐瞒不报、不及时妥善处理；严禁未充分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并采取有效风险防控措施的情况下对外投资或承揽境外项目等。四是强化企业海外不规范经营行为责任追究。按照“谁投资、谁负责，谁签约、谁负责”的原则，加大对企业海外不规范经营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全面推进对走出去企业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突出对投资金额大、敏感性强、派出人员多项目的检查管理工作。对问题企业要依法依规及时认定违法违规行为的种类和性质，并依照有关规定对涉事企业采取没收不正当收入、经济处罚、取消政策支持、实行国别市场准人限制、列入不良信用记录进行综合管控、暂停开展相关对外投资合作业务等处罚和处理措施。

3、加强海外投资资金监管

以防范跨境系统风险为目标，以加强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测和完善备案报告管理为手段，加强对上海企业海外投资的资金监管。一是加强 FT 账户实时监测联动机制。应用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对跨境资金流动进行实时监测，由央行上海总部特别监测室对跨境资金流动的企业和个人进行“逐笔交易、一星期 7 天、每天 24 小时”实时监测。通过“电子围网”功能，自动计算企业能够从境外融资的上限，超过限额自动发现并预警。实施宏观预警，了解跨境资金流出流人的总体规模，切实防范金融风险。二是开展跨境财务结算中心业务统计。发改、商务部门主动与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建立工作联系机制，定期分析上海跨境财务结算中心和从事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或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试点企业的运行情况，了解企业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跨境结算量，培育在沪跨国公司财务结算中心。三是加强备案报告管理。针对各类境内投资主体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建立健全备案核准制度，减少和避免盲目性，完善对外投资报告制度，强化境内投资主体报告责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关键环节及时报告，对企业重大对外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和去向实行有效监控，做好分析评估和预警干预。

（三）怎么管：创新与企业海外经营相匹配的监管方法手段

着力在创新与企业海外经营相匹配的监管方法手段，包括以信用评级实施分类监管、以信息共享实施协同监管、以加强服务实施动态监管、以科技支撑实施精准监管、以国际协作实施联合监管等。

1、以信用评级实施分类监管

运用信用评级方法对“走出去”企业实施分类监管。除法律法规和国家部门另有规定的以外，根据“走出去”企业的信用等级和行业特征设置 A、B、C、D 四类进行监管，确定合理的监督检查频率，提高监管效果。一是对等级标识为 A 类的企业实施低频率管理。对该类企业减少或者免除日常监督检查，可以实行跨年度监督检查。二是对等级标识为 B 类的企业实施较低频率管理。对该类企业每年进行监督检查，监督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三是对于等级标识为 C 类的企业实施较高频率管理。对该类企业每年进行不少于 2 次的监督检查，重点监督违法失信行为的整改情况和了解依法需要关注的问题。四是对于等级标识为 D 类或列入国家规定的重点监控行业的企业实施高频率管理。如，实施境外重大合作项目的企业、出现重大经营亏损的企业、出

现重大工程质量问题或重大安全事故的企业、发生群体性事件的企业、收到群众举报或出现问题久拖不决的企业、不接受行业组织协调或被我国驻外使领馆反映问题的企业、被东道国政府处罚的企业、东道国政府向我国政府或驻外使领馆提出交涉的企业、引发国内外媒体负面报道的企业等，对该类企业加强日常监督检查或者增加抽查频率进行重点监管，及时监督违法失信行为的整改情况和了解依法需要关注的问题。

2、以信息共享实施协同监管

建立健全各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增强监管合力，推动各部门间信息共享，形成以跨部门联动响应、综合执法、信息互通等为主要内容的协同监管模式，解决部门监管不同步、监管机制不健全、监管手段不完善、监管信息不互通等突出问题。一是建立统计数据互通机制。发改、商务、外管、海关、银监等相关部门每季度互通互报相关统计信息，定期比对境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对外直接投资现汇出资部分外汇登记数据、境外投资和对外工程承包项下出口数据以及主要金融机构境外投资贷款数据等。二是完善监管信用信息联动约束机制。推进跨部门、多领域的信用信息综合管理运用，逐步引入司法、金融、税务等部门相关信息，实现信息查询高效便捷、平台管理安全有序、上下左右互联互通，为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形成信用监管闭环奠定基础。三是构建司法协同监管机制。借鉴上海自贸试验区法庭相关做法，构建由商业信用共促机制、风险提示机制和事中事后共管信息共享机制共同构成的司法协同监管机制，与市场监管、海关等监管部门协作，实现常态双向沟通和公检风险信息共享，对重点行业领域所出现的跨境风险进行风险提示。

3、以加强服务实施动态监管

完善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的动态监管机制，以预警纠偏为导向，以化解市场风险为目的，对“走出去”企业的市场行为采取实时监测、跟踪分析、随机抽查等方式，强化对市场主体及有关人员的事中事后监管。一是探索以“双随机”方式加强动态监管。以“双随机、一公开”机制，试点选取行业领域作为抽查试点，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及时公布查处结果，减轻企业频繁接受监管的压力，提升执法效率。二是进行境外高科技投资及其绩效情况分析。不断提高“走出去”对创新的驱动力度，积极跟踪上海企业境外高科技并购和境外研发机构的后续经营状况，及时了解企业通过境外高科技投资引进的专利和科技成果在沪落地、孵化和推广现状。三是定期统计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运营进度。不断完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投资主体报表报送制度，定时收集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土地租赁转让、园区公共服务、招商进展和开发收益等情况，在加强服务的同时，监督对外投资建设落到实处。

4、以科技支撑实施精准监管

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化、科技化手段提升监管的精准化、智慧化水平，通过“互联网+”监管模式，实现在线即时监督监测，优化监管流程，提高监管效率。一是建立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检测服务平台。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在线检测并及时检查境外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的真实性、合规性，加强指导协调、风险预警和突发事件处置，引导企业强化管理、规范行为。二是研究区块链技术对创新“走出去”企业监管手段中的作用。推进“区块链+大数据”在跨境贸易、信息共享等领域的应用模式，积极探索契合区块链新型技术发展的监管模式，研究“沙盒机制”在跨境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中的运用，不断增强政府对现代科技的适应性，运用新科技、新手段打造监管“利器”，提高监管和执法效能。

5、以国际协作实施联合监管

完善国际政策协调体系，加强国际联合监管，完善对外投资风险管理。一是建立与东道国银行机构合作监管机制。与“走出去”企业对外投资东道国银行机构合作，调查产业资本流动的去向与方式。二是倡导国家层面签署与其他国家的税收相关协定。建立起由税收协定、税收情报交换协定和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等构成的税收协定网络，在与国际社会联手共同打击国际逃税、避税的同时，维护本国权益。三是建立对外投资国别风险数据库及风险评估和预警体系。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动态，

对于拟投资和已经投资的项目在政治风险，经济和技术安全以及是否违反我国以及东道国法律法规方面，进行必要的监控和限制，以便建立风险预测、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四是完善对外投资企业的应急保障体系。充分利用我国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国别信息指南，为对外投资合作企业提供投资障碍、风险预警等信息，建立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和应急预案。督促企业及时到驻外使领馆报到。发生境外突发事件时，确保企业及时获取驻外使领馆和国内有关部门指导，保障外派人员生命财产合法权益。